

龙月刊丛书

当代中国学人 访谈录

哲学卷

沈国明 金福林◎主编



當代中國學人 訪談錄

哲學卷

沈國明 金福林◎主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学人访谈录.哲学卷/沈国明,金福林主
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学术月刊丛书)

ISBN 978-7-208-12422-6

I. ①当… II. ①沈… ②金… III. ①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中国-现代 ②哲学思想-研究成果-中国-现代
IV. ①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3471 号

书名题签 沈国明
特约编辑 盛丹艳
责任编辑 鲍 静
封面设计 潘海涛

· 学术月刊丛书 ·

当代中国学人访谈录·哲学卷

沈国明 金福林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7.5 插页 5 字数 429,000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422-6/C·468

定价 68.00 元

写在再出发的路上（代序）

夏锦乾

记得在去年一次讨论会的间歇，新任《学术月刊》总编辑金福林同志向我聊起他上任后的一些想法，其中就谈到要编印一套4卷本的《当代中国学人访谈录》，把近十年来发表在《学术月刊》“中青年专家访谈”栏目的文章汇集起来，接续此前这一栏目曾经出版的《智慧人生》一书，形成一个完整的学人访谈系列。我知道，以目前《学术月刊》的人力、财力来说，这算得上是一项重大工程了。我在敬佩之余，私下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所以也没有认真放在心上。哪知没过多久，金总编打来电话，他们竟然把目录和大纲都编出来了，他还热情地说：“你就为这套书写几句吧，毕竟当初你和其他的老同志们都是这个栏目的经手人！”这话倒是勾起了我许多的记忆和感慨。时间真快，一晃我们都从“小青年”变成“老同志”了，

而这个“当初”距今也至少有十五个年头……于是我无辞推让，写了下面三段文字。

第一段：一句话和一个栏目

说起创办“中青年专家访谈”栏目的缘由，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李储文先生，当年是他的一句话，才得以有了这样一个栏目。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社会活动家，他在担任上海市社联主席的十余年间，为上海社科界作了很多实事，其中一件便是大力扶持中青年学者。他在一次社联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建议：“要多给中青年学者创造条件，以利于他们茁壮成长”。于是《学术月刊》的同仁们商议着要办一个栏目来响应李主席的这个建议，栏目的思路就是“以论文与访谈的形式，从回顾治学历程、总结治学成果与经验入手来展现当代学人的风采”，归纳起来，就是“大访谈”+“专论力作”，突出创新二字。这是把栏目的主魂确定了。这自然得到李主席和王邦佐书记的支持，一切很顺利。但接下来，在栏目的取名上倒是费了很多心思。名字不但要切题、醒目，还要叫得响，最好还能赶上刚刚兴起的网络世界的节奏，“学人访谈录”这个名字一开始就想到了，但比较平实，作为一本书的书名果然不错，若要放到一本学术期刊的目录之中，就显得啰嗦、重复，因为整本期刊发表的都是当代学人的作品，这又何必单单在其中一个栏目上再画蛇添足？更重要的，它没有把栏目中“专论力作”的意思包括进去。最后，我们把它定名为“中青年专家网页”。这个名字既突出了“中青年专家”，又因为借用“网页”两字而沾了点E时代的气息，算是得到了较多人的赞同。这个名字后来一直沿用到了2006年。

在这些年里，《学术月刊》每期都推出一位中青年专家，一万字的长篇访谈，让青年学者们既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治学经历，又从容地梳理和总结了已有成果，这在以往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确是做到了“要多给中青年学者创造条件”的要求；加之一篇代表性力作，使得栏目的整体感很强，可谓是浓墨重彩地把一个个中青年学人的学术形象凸显出来。所以栏目一经推出，就受到学界的欢迎，许多有影响的学者纷纷拿着“专论力作”前来联系，积极参与栏目，把能进入这个栏目当作是一种学术荣誉。到2002年《学术月刊》创刊45周年时，就已经有39位中青年学人在这个栏目中显露峥嵘，我们就

把他们的访谈汇集起来，编成了《智慧人生——中青年学者访谈》一书，给当年刊物的生日庆典增添了不少亮色。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储文主席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真正道出了他之所以要扶持中青年学者的深意，他说：“科学的发展，核心问题是理论创新，而中青年学者通常是理论创新的骨干与主力，自然科学是如此，哲学社会科学也不例外。”他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以及严复、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等大家都是在年轻时代就创造了能影响社会发展的学术大业的事实，然后针对所谓“呼唤当代学术大师”的说法，乐观地指出：“当代形态的学术大师不用呼唤，他们已经或正在当今这群充满生气与锐气的中青年学者群中产生！”这些话都把我们大大地振奋了起来，想不到李主席把扶持中青年学者的工作赋予了如此深远的意义。一个栏目如此紧密地联系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学术事业，如此的胸怀和情操，升华了我们栏目的境界。

至2006年，编辑部对已经坚持了7年的专栏作了一些调整，将专论力作分拆到文、史、哲、经各个学科中去，加强了学科栏目的分量。由于“网页”只剩下一篇访谈，所以栏目名称也作了相应的改变，叫做“中青年专家访谈”，这个名称一直延续至2013年底。

第二段：一个宗旨和一辈子奉献

在《学术月刊》近六十年的办刊历程中，像这样的专栏故事是举不胜举的。而每个故事应该说都是《学术月刊》那不变的精神传统的显现。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传统？以我浅薄的认识，便是几代人对于学术的虔敬和追求。2007年，一篇代表编辑部的“序文”说得好：“学术者何？学术乃经国之大业，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依托。学术不仅让我们认识世界，而且是让我们掌握世界，给世界以意义。一个上进的民族必然以学术为前导，奉学术如神明。”记得老总编王亚夫先生在世时常常说，《学术月刊》的全部工作就两词：“学术”、“月刊”，它既是我们的刊名，也是我们的宗旨。老总编口中的“学术”，我理解绝不是指目下流行的所谓奖杯、名次，以及一些无聊的鲜花和掌声，那些都是游离在学术之外，只会做些帮忙或帮闲的玩意，真正的学术是直指问题本身，在认识问题、思考问题，推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促进人类知识的增长和观念的更新。比如，上世纪50年代《学术月刊》开展的对于“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讨论，当大多数人在政治挂帅的时代氛围中热衷于生产关系（制度）决定论时，《学术月刊》就从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提出了“生产力”的问题，李平心先生的《论生产力的性质》等系列文章就成了不朽的警世之作。与当时的一帮帮闲学者拼命论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论”相比，他的文章才提出了时代的真问题，虽然这个问题直到二十多年后，中华民族付出了“文革”浩劫的沉痛代价后才被真正认识与理解，但正是这样的研究，才彰显了民族的理性之光、希望之光。再比如，80年代中期关于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90年代关于上海史问题的讨论，以及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鸣等等，尽管这些问题的属性有大小，涉及的领域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提出了当时时代所迫切需要解答的真问题。一个学术期刊的安身立命之处就在它提出的问题之中，它与问题共存亡。没有问题，或提不出问题的学术期刊，不论其级别多高，都不配称为学术期刊。而专注于问题的学术期刊，需要拒绝喧嚣与骚动，需要忍受清贫与寂寞，甚至需要担当风险，丢官罢职，直至搭进生命，但正因此更赢得人们的尊重和敬仰。

如果说“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那么，学术期刊者，非期刊本身也，乃期刊人也。近六十年来，《学术月刊》在中国学术界做出了一些成绩，赢得了一定声誉，这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坚守了“学术”和问题的探讨这一精神传统，而关键就在于有一支“为学术所寄”、“为文化所化”的编辑队伍，他们是精神传统的主体。被称为“学术月刊人”的数代编辑们正是信守着学术的传统，以“我不作嫁衣，谁作嫁衣”的襟怀和气概，在《学术月刊》默默地奉献了一辈子，“青丝熬成了白发，皱纹写在了额头”，在常人眼里，他们是一批傻人，他们明知在这里只有付出，而无利可图，无高枝可攀，却仍勇往直前，决不三心二意，半途而退。他们真正担当得起“学术月刊人”这个素朴的称号！从个人而言，他们都是极其普通的人，但是加在一起，他们却做出了极不平凡的事业！在这些普通人之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三位老总编：王亚夫先生、黄迎暑先生和王邦佐先生。他们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属于学者型的编辑家。亚夫先生早年投身革命，写过很多诗歌作品，词采飞扬，新中国成立后转入历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迎暑先生对文艺与宗教都有极精深的研究；邦佐先生则是国内著名的政治学专家。他们不但

眼光；同时他们又都充满着人格魅力，谦谦君子心，诺诺不相忘。他们三人担任《学术月刊》总编辑的时期，也是刊物三个最重要的时期，从草创奠基到快速发展到转型蜕变，他们一代衔接一代，薪火传递，守护着刊物的崇高品位。他们无疑就是“学术月刊人”的代表。

第三段：一个目标和一点期盼

今天，《学术月刊》正走在再出发的路上。这条路前辈的编辑家们都不曾走过，它考验着我们走路人的智慧和定力。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五千年未遇的市场经济，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精神与文化，它给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一系列时代的真问题，它们需要当代学者们潜心的研究。作为“学术月刊人”更应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研究之中，敏锐地抓住真问题，推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市场的意义对于当代学者而言是多方面的，它既是一种激励与解放，但同时也是一种诱惑乃至腐蚀。普遍的学术平庸和耸人听闻的学术腐败事件，常使人对今天的学术界产生担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学术期刊同样难以免俗。我在两年之前就写过一篇小文，提醒人们“必须正视学术期刊与学术腐败的关系”。至今我仍然认为，学术期刊应严于律己，不应为学术腐败推波助澜。以我的有限经验，学术期刊自身腐败的第一步，便是把本应专注于问题的眼光移向别处，而醉心于问题之外的东西。好在我们“学术月刊人”有着一个强大的传统，它强大就强大在它改变你，而决不为你所改变。我衷心地希望在再出发的路上，继续保持这一传统，并且不断地发扬光大，这将成为我们唯一不二的目标，果真如此的话，学术者幸甚。

此外，我所期盼的是建设好编者和作者两支队伍。对于像《学术月刊》这样高级别的期刊，需要的是学者型编辑，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之内都是专家，只有如此才能对学术的前沿问题有敏锐的发现，也才能与学科的顶级专家们交流、对话，以专业性打造前沿性和权威性。这也是《学术月刊》作为一本学术期刊的性质所决定的。需要说明的是，期刊不同于杂志，在英语中“Periodical”、“Journal”不同于“Magazine”，前者特指一种研究性的不同专业领域内的定期出版物，而后者则更多地指生活性、普及性和时尚性的通俗读物。今天期刊界常常混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出版物，用“杂家”（它的另一

个名字叫“职业办刊人”)的杂志编辑的标准去要求期刊编辑,严重地损伤了期刊的专业性。因此,抓好编辑队伍,重点就是抓好编辑的专业性。要让我们的编辑们都像老总编们那样成为某一专业的专家、名家。有了这样一支精通专业的编辑队伍,那么作者队伍的建设也就水到渠成了。作者队伍的建设有二,一是广泛性,学术期刊要广交朋友,老中青一个都不能少,切忌眼里只有几个当红的学者。要有不同的渠道和平台,“中青年专家网页”交的就是中青年的朋友;“学术名家”则是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的天地;当年还有“学术通讯员制度”,瞄准了一批即将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在校研究生。二是深入性,要深交朋友,你写我编的日常工作还不能说是交朋友,好的编辑常常守候着学者十年磨一剑的艰难探索过程,并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者的研究潜力,这种编者与作者深交的情谊最终都会凝结在学术研究的成果之中。对于一个编辑而言,他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能找到这样的深交着的作者朋友。

再过两年,《学术月刊》就要满六十周岁了。六十年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成熟,是圆满,是升华,更是再出发,祝愿她充满活力,永葆青春!

目 录

写在再出发的路上（代序）夏锦乾 / 1

哲学反思之路——孙正聿教授访谈 / 1

学习是学者的永恒美德——万俊人教授访谈 / 15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何萍教授访谈 / 27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自觉——郭齐勇教授访谈 / 45

马克思哲学：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杨耕教授访谈 / 61

充分认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陈学明教授访谈 / 71

拓展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思维空间

——李维武教授访谈 / 82

- 问渠哪得清如许——张异宾教授访谈 / 98
- “成人”的哲学——邓晓芒教授访谈 / 110
- 不忍终结，于是寻找出路——韩水法教授访谈 / 125
- 日常生活批判：一种真正植根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衣俊卿教授访谈 / 138
- 走向实践哲学之路——王南湜教授访谈 / 152
- 用学术支撑思想 用思想传递时代——韩庆祥教授访谈 / 165
- 探求中国哲学的多样形态——陈少明教授访谈 / 178
- 从传统理解现代 以现代解释传统——景海峰教授访谈 / 189
- 徜徉在佛学与儒学之中——赖永海教授访谈 / 204
- 探寻存在的现代样式——邹诗鹏教授访谈 / 214
- 求索于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李翔海教授访谈 / 225
- 走向出场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路径与未来趋势
——任平教授访谈 / 238
- 在思想跋涉的途中——张曙光教授访谈 / 251
- 探索当代哲学研究的多维视角与问题体系——欧阳康教授访谈 / 262
- 努力推动哲学观念的深入变革——贺来教授访谈 / 274
- 走向“主体性”与“社会性”的合作——刘森林教授访谈 / 286
- 眼睛向下 境界向上——邹广文教授访谈 / 297
- 追求社会学理论思维与经验研究的综合——刘少杰教授访谈 / 308
- 坚持学术争论 注重分析方法——段忠桥教授访谈 / 320
- 学术的视野与学者的使命——金太军教授访谈 / 331
- 把不可说变可说 把可说的说清楚——陈嘉明教授访谈 / 343
- “顶天立地”的学术追求——樊浩教授访谈 / 355
- 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学风——汪信砚教授访谈 / 367
- 田野与政治：实证方法的引入与研究范式的创新——徐勇教授访谈 / 382
- 探求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周晓虹教授访谈 / 393
- 政治价值观与优良政治生活的构建——桑玉成教授访谈 / 404
- 现实关怀、理论自觉与时代变迁——李友梅教授访谈 / 416
- 后记 / 426

哲学反思之路

——孙正聿教授访谈

孙正聿 欣 文

孙正聿，1946年生于吉林市。1982年初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先后于1988年、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现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学位委员会人文学部副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哲学学会会长，吉林省政协常委。2000—2001年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2001年被评为吉林省特聘教授。

主要著作有：《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现代教养》（二人合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崇高的位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超越意识》（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在

《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先后于 1995 年、1998 年、1999 年和 2001 年获得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第二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五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四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998 年和 2001 年被评选为首批和第二批吉林省省管优秀专家，2000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欣文，《学术月刊》编辑。

● 孙先生，听学界朋友说，您在 1966 年高中毕业时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哲学专业，1977 年恢复高考时您的第一志愿又是哲学系。您为什么会如此执著于哲学呢？

◎ 我在中学读书时总是喜欢阅读各种各样的“课外书”，特别是喜欢各种作品中的深沉的思想以及思想家的传记。记得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过，“跟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最引人入胜的科学”。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特别向往哲学，并在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哲学系。可是就在临近高考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在 1966 年底到 1968 年底两年间，由于既无学可上，又无工可做，我便自己大量阅读了那时可以看到的书籍，其中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鲁迅全集》。在鲁迅的作品中特别是在他的各种杂文集中，我深深感受到一种思想的穿透力；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则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理论的魅力。

当年阅读的这些理论著作主要激发了我的理论兴趣和拓宽了我的理论视野，但当时的我却没有能力进行深沉的理论思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是一些格言警句式的名言，但还不是思想本身。马克思说过，在太阳的光辉中每一颗露珠都会闪烁五颜六色的光芒，为什么人的精神却只能有一种颜色即灰色？在“文革”年代，那么多传递知识的书籍被烧掉，那么多有知识的人被批斗，这对一个有志于读书的青年来说，既痛心疾首，又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也追问：人的精神怎么能只是一种颜色？20 多年后我的博士论文出

版时，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会想到把哲学归结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我想，这不仅是一种理论探索的结果，而且也是我20多年来执著地追问生活的产物。

● 您的《哲学通论》在1998年出版后，一直得到哲学界的普遍关注。能否请您自己评价一下这部著作？

◎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评论这本书，那就是“应运而生”。我在1994年写的《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那篇文章中，曾把建国后的中国哲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的哲学”，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后教科书哲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以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出发点去研究哲学；20世纪80年代，是以改革教科书为出发点去重新理解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20世纪90年代，则是以开放的视野去重新理解哲学，并在此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哲学通论》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理解哲学的过程中产生的。

● 对您在《哲学通论》中对哲学的解释，我们非常感兴趣。能否简要地谈一谈？

◎ 我需要分几层意思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感到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最大问题，是把对哲学的理解限定在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之中，也就是仅仅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哲学，而没有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多种方式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和解释哲学。我觉得这是理解哲学中的最大问题，所以也是整部《哲学通论》着力论述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通常是这样解释哲学的，即：科学以世界的不同领域为对象，提供对世界的各种特殊规律的认识，而哲学则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提供对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认识。显然，这就是从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去解释哲学，因而把哲学解释成关于“普遍规律”的科学。由此又合乎逻辑地引申出两个主要观点：一是用“科学”与否去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所有哲学，二是把哲学的合理形态以及哲学的发展趋向归结为“哲学科学化”。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解隐含着许多不容回避的问题。

首先碰到的是哲学的对象问题，也就是哲学是否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对此我提出了几个方面问题：一是怎样理解哲学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而“观”之，还是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根本观点”？二是怎样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是以“思维”和“存在”为对象，提供关于“思维”和“存在”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还是哲学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进行“反思”？三是科学的发展逐步把哲学“驱逐”出了“自然界”、“历史”和“思维”，这样，哲学还能否越俎代庖地研究“整个世界”？

随之而来的是哲学的特性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是如何区分哲学与科学的问题。我在《哲学通论》里着力讨论了这个问题。我的基本认识是：不是哲学恰恰是科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从而构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而哲学则是以科学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加以“反思”。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是“反思”关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曾经风趣地说，只有当着哲学被“驱逐”出它的全部“世袭领地”并且“无家可归”的时候，哲学才真正做到了以“四海为家”，也就是把人类所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都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

● 谈到这里，我想起学界对您的一种评价，认为您在当代中国哲学界是长于“思辨”的。这是否跟您把哲学解释为“反思”有关系？怎样看待学界对您的这种评价？

◎ “反思”与“思辨”是分不开的。“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思辨”是“思想辨析”或“辨析思想”。“反思”需要诉诸“思想辨析”或“辨析思想”的“思辨”，而“思辨”则必须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才成其为哲学的“反思”。这就是说，“思辨”应当是哲学“反思”的活动方式，善于“思辨”应当是我的努力方向。

● 但在人们的通常理解中，“思辨”似乎有脱离实际的意思，甚至有“概念游戏”的意思。孙先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 我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哲学就是“没事找事”，就是“概念游戏”。我在《哲学通论》里说，科学是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而哲学是把简单的东

西变复杂。这就是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区别。哲学总是以“不证自明”、“不言而喻”、“毋庸置疑”、“天经地义”的“自明性”为对象，从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熟知而非真知”的地方提出问题，这不就是“没事找事”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或科学研究中，有谁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如果一个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追问“我的思维能否反映存在”，他还怎么进行科学研究？（所以我特别欣赏恩格斯的一段话：“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不都是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当作“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吗？对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提出问题，还不是“没事找事”吗？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正是这些“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无条件的前提”，对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最根本的意义。例如在量子力学中一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就是：经过宏观仪器显现的微观粒子究竟是不是微观粒子本身？这不就是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吗？在人的全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按照各种既定的“规则”进行“游戏”，那么这些“规则”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人们是否可以按照新的“规则”进行新的“游戏”？哲学的“没事找事”是把看似简单的东西揭示出它本来的复杂性，是把按照一定“规则”的“游戏”揭示出它的“游戏”的“规则”，是把思想、观念中隐含着的“假定”、承诺着的“前提”从“幕后的操纵者”变成“前台的表演者”，是把人类生活中的是非、进退、祸福、荣辱、毁誉的种种悖论变成理论形态的自我意识，是以理论形态去表现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自我意识。我想正因如此，搞哲学的人常说哲学是“无用之大用”，即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大用。

用我的说法，哲学的这种“没事找事”、“无用之大用”，是通过“概念游戏”来进行和实现的。哲学反思的思想是以概念的方式存在的，所以，对思想的反思也就是对概念的反思，或者叫作“概念游戏”。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对“概念”的理解。用列宁的话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话说，“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文化的‘水库’”。这些不同的说法表达了某些共同的意思，那就是：概念、范畴、语言凝结着人类文明；哲学的“概念游戏”或“语言游戏”是以哲学的方式反思人类思想和人类的存在。我在《反思：哲学的思维方式》那篇文章中说，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承诺”、“观察渗透理论”、“合法的偏见”、“存在的遗忘”等命题可以说是整个20世纪的“世纪性命题”，它们以时代性的哲学理念表征了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当我们思考这些“世纪性命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的哲学内涵正是成立于对“形而上学”、“本体论”、“观察”、“偏见”和“存在”这些“概念”的“思辨”。例如，卡尔纳普就是从语言的“表述”和“表达”两种基本职能去辨析“形而上学”的非“表述”性，从而“拒斥”把“形而上学”当作“科学”；蒯因则通过对“本体论”的“思辨”，把本体论问题区分为“本体论的事实”与“本体论的承诺”，从而使现代哲学普遍地以“承诺”的观念重新理解本体论。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中，无论他们本人如何评价“思辨”，却仍然是以“概念游戏”的方式构成了他们各自的哲学。因此我想强调是，人类是以各种特殊的活动方式或工作方式把握世界的。对“概念”进行“思辨”正是哲学区别于宗教、艺术和科学的活动方式或工作方式。如果哲学不去“没事找事”、不进行“概念游戏”，哲学为何、又如何存在呢？

● 您在《哲学通论》和其他论著中都强调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或“思想中的现实”，这同您所说的“没事找事”、“概念游戏”有没有矛盾？

◎ 前不久我在《江苏社会科学》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哲学如何面向现实》。我一直觉得，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自觉地处理好双向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单向的关系问题。就是说，一方面是必须持之以恒地坚持哲学“面向现实”，另一方面则是必须自觉地以“哲学方式”面向现实。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或“思想中的现实”，它所面对的“现实”是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每个时代的“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是每个时代“人类生存的矛盾与困境”，而不是琐屑细小的事件，不是各种各样的实例。所以哲学的“面向现实”首先是以“拉开间距”的方式实现的。哲学与现实“拉开间距”，才能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从而全面地把握时代精神、深层地透视时代精